「排滿」革命與國史重建

○ 王春霞

二十世紀初現代「民族國家」觀念傳入中國,從歷史的角度出發,也就存在著一個民族國家 再造的過程。正如有的學者認為的那樣:現代民族國家都有對國史上年代悠久的史跡之紀 念,但它們往往是晚近產品¹。辛亥革命時期,革命派提出「排滿」,要求建立漢民族的共和 國,對於「國史」的重新締造也成為革命派的時代任務。因此,他們書寫的歷史均以漢族族 體為中心:除了尋求漢族的起源、歌頌漢族的始祖之外,還宣揚漢族與其他少數民族的輝煌 鬥爭史、湧現的英雄豪傑、以及漢族悠久燦爛的文化,等等。本文著重以史料來重現當時的 「國史」,以期對辛亥革命有更全面的理解。

一 漢族始相——黃帝

黃帝原是一位部落首領,屬於姬周族。隨著後來以周族為核心的各部族逐漸融為一體,黃帝也就成了新的共同體——「華夏」的初祖。司馬遷作《史記》,在《五帝本紀》裏不僅把黃帝列在了所有帝王之首,而且把其他幾位古帝都說成是黃帝的直系子孫,甚至以後的「三王」——夏、商、周三代國家的始祖,也都是黃帝的直系後裔²。但是,自漢武帝獨尊儒術後,儒家一直提的是三代、堯、舜,孔子是其中的中心人物。黃帝因漢初黃老並稱,後來逐漸演變成方術的守護神,開始與民族的始祖身份分離。

到了20世紀初,國人都是「黃帝子孫」的說法開始普遍起來。清末率先尊黃帝為漢族始祖的是部分改良派人士。1901年,梁啟超在《中國史敘論》中指出:「漢種,即我輩現時遍佈于國中,所謂文明之胄,黃帝之子孫是也。」³歐榘甲也說:「合中國漢族之始祖,黃帝也;合中國漢種各族姓所自出,黃帝之子孫也」⁴。當時他們如此提法,似無多少政治用意,只是為了比較清楚地說明國內各種族類。而革命派在晚清掀起的尊崇黃帝的高潮,則是宣導大漢民族主義的表現。革命派黃節說:「衡陽王氏,當有明鼎革,抱種族之痛,發憤著書,乃取軒轅肇紀,推所自出,以一吾族而統吾國。」⁵明清之際的王夫之為重視黃帝的大學者,他於1656年完成《黃書》,提出「畛」之觀念:「人不自畛以絕物,則天維裂矣。華夏不自畛以絕夷,則地維裂矣。」⁶他視黃帝時代為華夏畛域之界定者,對其他族系只「講其婚姻,締其盟會……甥舅相若,死喪相聞,水旱相周,兵戎相衛……名系一統,實存四國」⁷。王氏的黃帝界定中國「種類」畛域之說,在晚清已成漢民族主義者之共識。

1902年,章太炎等在日本橫濱舉行「支那亡國二百四十二年紀念會」,用公共回憶的方式來重新想像漢族團體,把明清的改朝換代說成是「亡國」,把日本稱呼中國的「支那」當本國名稱。章在會上頌揚南明抗清志士,並呼籲江浙人士模仿他們⁸。在「亡國紀念會」後,留日學生界以省份命名的反清刊物如雨後春筍,如《江蘇》、《浙江潮》、《湖北學生界》等。《新廣東》一文中即明確說明:「今所謂朝廷者,乃韃靼之種,其部落居於滿洲長白山之

下,在萬里長城之外,本與我中國黃帝之子孫不同種族者也。……應以土地還之中國人, ……夫中國者中國人之中國也。」⁹此時,各地的漢民族主義者都有樹立黃帝為共祖之運 動。1903年4月出版的《江蘇》雜誌第二期用的還是光緒二十九年,五月出的第三期便改為黃 帝紀元四千三百九十四年。革命黨機關報《民報》第一期刊首印有黃帝像,圖下說明「世界 第一之民族主義大偉人黃帝」。1903年軍國民教育會宣告成立,會員徽章的正面鐫黃帝像, 背面小字為「帝作五兵,揮斥百族,時惟我祖,我膺是服」¹⁰。軍國民教育會以黃帝為徽章 的圖案,顯然寓有反清的意圖。正如當時軍國民教育會的重要組織者秦毓所說:「徽章制黃 帝之像,宗旨所在,不言而喻」¹¹。

1903年5月,鄒容在《革命軍》中說:「滿洲人與我不通婚姻,我猶是清清白白黃帝之子孫也。」 ¹²6月,章太炎在《駁康有為論革命書》中稱:「滿人既不可欺,富貴既不可復,而反使炎黃遺胄,受其蒙蔽,而緩于自立之圖。」 ¹³7月,劉師培在《黃帝紀年論》中說:「黃帝者,漢族之黃帝也。」 ¹⁴接著又在《攘書》裏說:「炎黃之裔,厥惟漢族」 ¹⁵。陳天華也在次年的《猛回頭》裏把黃帝喚作「始祖公公」 ¹⁶,望他「給漢種速降下英雄」,以匡國難 ¹⁷。孫中山在《軍政府宣言》中也稱:「我漢人同為軒轅之子孫」 ¹⁸。之後,革命派類似的稱呼比比皆是,如稱「我同胞四萬萬黃帝之胤」 ¹⁹、「世界民族第一之黃帝胄裔」 ²⁰、「吾聰明靈秀之黃帝民族」 ²¹、「神聖祖宗黃帝」 ²²、「我四百兆黃族」 ²³,等等。許之衡指出:「近日尊崇黃帝之聲,達於極盛。以是為民族之始祖,揭民族主義而宣導之,以喚醒同胞之迷夢。」 ²⁴劉師培認為:「欲保漢族之生存,必以尊黃帝為急。黃帝者,漢族之黃帝也,以之紀年,可以發漢族民族之感覺。」 ²⁵

1908年,同盟會陝西分會會長李仲特與井勿幕、郭希仁等人還組織同盟會員在重陽節祭掃軒轅黃帝陵。重陽節那天,會員們假扮成延長油礦考察員、商人、獵戶等,紛紛趕往黃陵。最後到達黃陵參祭的共有三十人。祭陵儀式莊重儉樸,參祭者在黃帝陵前宣誓:「驅除韃虜,光復故物,掃除專制政權,建立共和國體,……以紓民生之苦,以復漢族之業。」²⁶

黃帝作為漢族的始祖,自然也應是「民族國家」的起源。 1903年7月,劉師培發表《黃帝紀年論》,倡行黃帝紀年以取代光緒紀年和耶穌紀元。他說:「凡一民族,不得不溯其起原。為吾四百兆漢種之鼻祖者誰乎?是為黃帝軒轅氏。是則黃帝者,乃製造文明第一人,而開四千年之化者也。故欲繼黃帝之業,當自用黃帝降生為紀年始。」²⁷宋教仁也主張以「(黃帝)即位之年為紀元,為漢族開國之一大紀念也。」²⁸之前,黃興也曾使用黃帝紀元。黃帝發明後,當時計算的方式並不統一:於1904年創刊的《黃帝魂》將該年定為黃帝紀元4614年,而《國民報彙編》則把同年推算為4395年,《二十世紀之支那》、《民報》、《洞庭波》、《漢幟》則用同一系統,分別把創刊年1905、1906、1907年改為黃帝紀元4603、4604、4605年。1905年,宋教仁根據《皇極經世》、《通鑒輯覽》等典籍推定是年為黃帝即位4603年,同盟會機關報《民報》創刊時即以此署年。辛亥革命爆發後,湖北軍政府、滬軍都督府等地方革命政權也大多以此紀年。南京臨時政府成立時,當選為臨時大總統的孫中山先生正式決定中華民國改用按《民報》推算的黃帝紀年,並通令全國執行。中華民國元年定為黃帝4609年。

然而,關於黃帝的來源國人並無多少認識,西方學者主張外來說的居多²⁹,其中最占勢力的 是法國學者拉庫伯里(Terriende Laconperie)的美索布達米亞西來說。拉庫伯里在1894年 寫的《中國太古文明西元論》一書中認為:兩河流域的君主尼科黃特率領巴克民族東徙,途經昆侖山,輾轉來到中土定居,乃是漢民族的前身³⁰。此說被中國學者所採納,也都相信黃帝與中國民族起自昆侖山。如宋教仁在《黃帝肖像題詞》一文中即寫道:「嗚乎!起昆侖之頂兮,繁殖於黃河之滸。」³¹劉師培在《攘書》開篇也寫道:「漢族初興,肇基西土,而昆侖峨峨,實為巴克民族所發跡……」³²林獬發表在《中國白話報》上的《國民意見書》上也說:「原來我們中國漢種從前是住在西方帕米爾地方,昆侖山下。」³³1904年陶成章發表《中國民族權力消長史》,其中詳細考證了漢族祖先的遷徙史,並專門闢了六節敘述黃帝的地位和戰功。

其實,把黃帝作為漢族的祖先,只是一面之辭。因為古代人們也把他作為各少數民族的共同祖先,不僅歷代漢族統治者尊黃帝為祖先神,而且魏、遼、夏、金、元、清等少數民族政權也紛紛承認自己為炎黃後裔。因此,改良派對革命派的這種說法給予駁斥和批判。康有為說:「滿洲云者,古為肅慎,亦出於黃帝後」,「我國皆黃帝子孫,今各鄉里,實如同胞一家之親無異」,排滿論「不過宋、明來據夷之舊論而已。」³⁴嚴復認為滿漢「同是炎黃貴種,當其太始,同出一源」,排滿民族主義乃「宗法社會之真面目也」³⁵。

二漢族英雄譜

很明顯,革命派突出「黃帝」,認同「漢族」的目的是為了「排滿」。革命派主張,「中國者中國人之中國也……有染指於我中國,侵佔我皇漢民族之一切權利者,吾同胞當不惜生命,共逐之」³⁶;「誅絕五百萬有奇之滿洲族,洗盡二百六十年殘慘虐酷之大恥辱,使中國大陸成幹淨土,黃帝子孫皆華盛頓」³⁷。

為了激起革命者的民族自豪感,鼓舞革命士氣,革命派又開始挖掘歷史上漢族的輝煌鬥爭史。「歷史者,非徒為古人作紀念之碑,將為今人發愛群之想。」³⁸因此宋教仁著《漢族侵略史》,盛讚漢族曰:「集合四百五十餘神明聰強之血族,盤踞四百六十餘萬哩肥美膏腴之地殼,操用五千餘年單純孤立之語言,流傳一萬四千餘形完富美備之文字,……其人類學上之價值,則不獨於亞細亞系統人民佔第一等位置,即於世界亦在最優之列。」³⁹他認為一個民族之所以能建立起國家,主要是能堅持「排外主義」與「進取之政策」。所以,他「專敘述漢族歷代以兵力征服外族,或滅其國、或略其地、或降其人之各事實」⁴⁰,以激勵國人進行革命。對於國內的少數民族尤其是北方少數民族的進入中原,宋教仁認為是漢族的「亡國」。他說:「滿洲人則更以其打牲遊牧野蠻兇悍之武力,施其犬羊奔突豕蛇橫噬之慣技,以與吾族難,一遇而國弱,再遇而國亡,……今之憂時之士,亟亟焉唱為民族主義,與夫復仇主義之說,以冀恢我勢力,完我國家。」⁴¹

1904年,陶成章在《中國民族權力消長史·敘例》中,開篇即提出 「中國者,中國人之中國也。孰為中國人?漢人是也。中國歷史者,漢人之歷史也。敘事以漢人為主,……則我祖先創拓之豐功,不敢不頌言也」42。他還說:「英雄者,歷史之產出物也;歷史者,英雄之舞台也。表贊已往之英雄,而開導未來之英雄」43。他盛讚漢民族的英雄,既有政治上的帝王豪傑、科技文化上巨匠鴻儒、也有熱心愛國的大義之士……皆「世界莫能及。」44

章太炎也特別注意以民族歷史激勵民族自豪感,增進民族主義的力度。他撰《中國通史》, 臚舉歷代保種衛國之帝王將相,一一為之考記,又撰文字、學術、禮俗、章制諸典,顧、 黃、王、顏、鄭、張以及至黨、逸民諸別錄,莫不寓有民族之大義⁴⁵。1908年,胡適也寫 道:「中國歷史有個定鼎開基的黃帝、有個驅除胡虜的明太祖、有個孔子、有個岳飛、有個 班超、有個玄奘,文學有李白、杜甫,女界有秦良玉、木蘭,這都是我們國民天天所應該紀 念著的。」⁴⁶

由於革命派的「排滿」主張,他們高舉種族革命的旗幟,要求他們所大力宣揚的「民族英雄」,多為歷史上漢族與他民族鬥爭中持抗拒態度的典型。首先躋身此一系譜,取得「民族英雄」之光榮地位者,為南宋抗金名將岳飛。1903年,《湖北學生界》率先刊載《中國民族主義第一偉人岳飛傳》一文,極力宣揚岳飛「精忠報國」、抗禦金人之偉大典範。1906年,《競業旬報》編輯傅君劍也撰有《中國民族排外第一偉人岳飛傳》的長篇傳記。作者于文末說道:「吾寧夭折早亡,以見我楚(?)清胡虜,志復中原的民族偉人岳飛。」⁴⁷馬敘倫則於《宋愛國士岳文二公傳》一文,並述岳飛、文天祥二人之事蹟,並寄望乎「愛國士之踵接而出」,以為漢族復興張本⁴⁸。《國粹學報》第15、16期於卷首接連刊出岳飛畫像與遺墨數幀,題識曰:「公抱種族之痛最烈,夙懷忠憤。今去公七百餘年,而公之排斥異族、忠君愛國之精神,猶可於此尺幅之上想見之云」。1904年,蕪湖安徽公學教師更發起組織「岳王公」,假岳飛抗金之精神,為反滿革命宣傳⁴⁹。

1903至1904年間,《新白話報》刊出題為《文天祥》的傳記小說,呼籲國人效法他們的愛種之心,投入排滿革命的行列⁵⁰。1904年《覺民》雜誌亦載有《為種流血文天祥傳》一文,譽之為「首豎義旗、攘斥胡虜,九死不屈、為種流血」之大豪傑。同年,有署名「遁園」者,於《揚子江》四期上刊載文天祥與謝枋得二人合傳。

此外,明末反清史事更因與排滿革命直接相關,尤為革命派所注目。如黃節的《黃史列傳》成傳的二十人中,明清之際抗節死義的忠烈之士或矢志光復的遺老孤臣有左懋第、張煌言、陳子壯、張家玉、陳邦彥、張斐、鄺露等七人。其他如夏完淳、朱舜水、李定國、張名振諸人,也有馬敘倫、陳去病等為之立傳,載於《國粹學報》諸號。在晚明的「民族英雄」中,傳誦最多的是史可法和鄭成功兩人。1903年,《江蘇》第六期載《為民族流血史可法傳》一文,將史可法比做文天祥第二,因為他們都是為民族而死⁵¹。同年《江蘇》第四期卷首附史可法畫像一幀,後錄詞一闋,對史可法「義析春秋、防嚴夷夏」的種族精神讚揚備至。1904年,《揚子江》第三期也刊出黎士宏所撰《史可法殉難記》一文,同樣譽之為「為民族流血之偉人」。同年,《漢聲》載有《陸沉痛》傳奇,描寫史可法死守揚州、兵敗殉難的懿行義烈,反復說明「種族」之義,號召國人高標義幟,「振起天聲,廓清故字」⁵²。

清末,對於鄭成功的敘事論述,數量之多,分量之重,是其他「民族英雄」所不能比的。1903年,《浙江潮》連載《中國愛國者鄭成功傳》長文。同年,柳亞子也在《江蘇》發表《鄭成功傳》一文⁵³。1904年的《中國白話報》也發表了白話文的《中國排外大英雄鄭成功傳》。除此之外,清末所寫詩文中涉及鄭成功的也有很多。如《國民日日報》即收錄詠贊鄭氏的長詩二首:劍公所撰《鄭成功》和慈石所撰《讀鄭成功傳》。1906至1907年間,有署名「浴日生」者於《民報》分期刊出《海國英雄傳》歷史劇,雖完成未及一半,但作者已于序言中肯定:「夫自莊烈殉國,韃靼入關,其不愧黃帝子孫,泣血誓師,不共天日,與逆胡抗戰,卒據台灣一片幹淨土,延明祀於二十餘稔者,其吾國英雄鄭成功之力也。」⁵⁴1910

年,《民報》復載《南洋華僑史略》一文,特辟專章以敘鄭成功據台抗清史事。

自然,漢族的歷史並非全是光榮的戰史和輝煌的成就,民族戰爭中的失敗和恥辱也是革命派藉以喚醒漢族同胞的手段。1907年,《民報》第十八號起連載《桑澥遺征》,以宋明忠臣義士的事蹟來鼓吹排滿⁵⁵。共輯《錢謙益致瞿文忠公蠟丸書》、《陳鑒哭臥子陳公文》、《劉均楊娥傳》(第十八號)、《陳臥子報夏文忠公書》(第十九號)、《陳臥子徐文靖公殉節書卷序》、《陳臥子袁烈婦傳》、《陳臥子玄絲傳》(第二十號)、《陳臥子皇明殉節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虞求徐公行狀》(第二十一號)、《夏存右大哀賦》(第二十三號)。《民報》第十九號《本社特別廣告》二說:「本社自二十期起,改定篇次,專以歷史事實為根據,以發揮民族主義,期於激動感情,不入空漠。海內外志士如有諳於明末佚事及清代掌故者,務祈據實直陳,發為篇章,寄交本社。又,宋季、明季雜史遺集,下及詩歌、小說之屬,亦望惠借原書,或將原書鈔錄,寄交本社,以資采輯,漢族幸甚。」

這種藉讀史以培養民族思想之理論,遂成為清末革命者所趨。魯迅說,東京留學生中有一部分人,「專意搜集明末遺民的著作,滿人殘暴的記錄,鑽在東京或其他的圖書館裏,抄寫出來,印了,輸入中國,希望使忘卻的舊恨復活,助革命成功。」56一時間反清英雄們的傳記、反清思想家的文集、太平天國的戰史、清軍入主中原的痛史、各種歷史古籍和珍貴的照片畫像,充斥於留學界。如《廣州三日記》、《嘉定屠城記》、《亡明流血史》、《亡國慘史》、《大明亡國痛恨史》、以及明末清初反清思想家顧、黃、王所著的《明夷待訪錄》、《原君》、《原臣》、《黃書》等都翻印出來,廣為散發。國粹派的黃節有感於國家種族之瀕臨滅亡,發憤作《黃史》,全書網羅歷代節烈志士凡一百八十人,實際成傳者二十人。陳去病則刊有《明遺民錄》一書,搜羅典籍至數萬卷,所傳人物,分省論次,氣勢尤為博大。還有馬敘倫的《嘯天廬搜幽訪奇錄》、劉師培之《刊故拾遺》、龐樹柏之《龍禪室摭說》等筆記雜誌,也都記述了大批宋明人物的佚行遺烈57。

三 「漢奸」痛史

除了異族與漢族是仇敵外,還有就是漢族內部的「漢奸」與非漢奸之分了。為了聲討國內「漢奸」助紂為虐,對歷史上臭名昭著的「漢奸」進行鞭斥也是當時宣傳的一個方面。

早在1903年,章士釗就寫了一篇《漢奸辨》來辨明真正的「漢奸」。作者認為,漢人與外人皆有稱「漢奸」者,其中必有混淆,故應辨明何種是真正的「漢奸」。「所謂真漢奸者,助異種害同種之謂也。」⁵⁸這自然是站在本族漢人的立場上而言的。對於滿人所謂的「漢奸」,「乃漢族中之偉人碩士,即為愛同類之故,甘心戎首,雖犧牲其身而不顧」⁵⁹。

1906年《漢幟》創刊,其《驅滿酋必先殺漢奸》一文回顧了中國歷史上的「漢奸」,只要是與非漢族人交往的,一概罵倒:遠自商周,周幽王被犬戎所殺,實為「漢奸」之「召戎伐周」,而「申侯鄫人為中國第一次賣漢之奸也」⁶⁰:周末狄人滅衛,也是衛人反戈助狄所致。

漢代高祖平城之敗,作者以為是「韓王信之為冒頓助」;漢武帝時李陵之敗,實「管敢」為單于報信所致;蘇武被羈留,則是衛律貪封而謀;匈奴一再犯邊,趙信屢為計畫;王昭君嫁胡,是一畫工所陷害,「石顯毛延壽尤為無形之漢賊」。

五胡亂華,「漢奸」尤多。有司馬穎之參北單于丞相事;孔萇之效命劉淵;有徐光、張賓為石勒謀;有王濟、高詡為慕容鮮卑謀;有呂婆樓為氐人符氏薦賢、王猛為之整軍、李威為之議政;於是胡禍蔓延,成南北分朝之慘局。北魏拓拔珪之所以能統一北方,實有李先教之讀書,後孝文帝「以胡人混合我種」,又是薛聰、李沖、李彪、高閭、王肅等人所助,總之,「無一非漢奸」⁶¹。

唐至五代,遇中國有事,則收胡兵助剿。如高祖欲平群雄,則稱臣於突厥;唐玄宗為控制河北,則用安祿山;唐肅宗欲平兩京,則徵兵回紇;唐僖宗欲討黃巢,則借軍沙陀……所以有唐一代,「舉國皆含有通虜性質」,也就無怪乎「虜禍不絕」了⁶²。五代亦是如此,為了一己私利,或與契丹結好,或稱兄弟,或稱子,「為千古中夏之奇辱」。更有一班人如韓延徽、盧文進、喬榮、李崧、馮道、劉昫、張彥澤,等等,為契丹成中原之天子,用心用力,「則是五代以來賂胡之辱」。其間只有唐太宗擊頡利可汗,周世宗殺漢內奸,而一展漢威,為漢族子孫「得意之舉」。結論是:「劉黑闥、劉武周、楊國忠者,隋唐之漢奸也;韓延徽、趙延壽、楊光遠、杜威、劉崇者,梁晉漢周之漢奸也」;「唐之高祖、玄、肅、僖,五代之朱溫、石敬瑭、劉知遠、郭威者,三皇五帝之漢奸,而唐太宗則三皇五帝之繩孫」;晉王李存勖因非漢人,為「三皇五帝之雜種也」⁶³。

有宋一代,有四戎之害,作者認為也是「漢奸」召之。如太祖聽信法吏之言,因忌漢將,始 有靖康之禍;楊業遭嫉,寇准受譖,張洎被黜,於是夏遼皆成大患;金之通宋,則有童貫、 王黼、趙良嗣、蔡京、蔡攸諸小人結金;宋北部失陷,因有張邦昌、劉豫、李梲杜的降金; 宗澤為汪黃所阻,岳飛為秦檜所害。

元因得姚樞,而漢人士大夫始有北向者;因得趙復,而北方始知學經講性理;因得竇默,忽 必烈始聞立綱常;因得許衡,而蒙古人始知崇孔孟、立學校、定官制;其他如劉整獻樊城、 范文虎叛安慶降、張弘範逼厓山、趙孟兆頁附金、等等「媚元諸臣」,「指不勝屈」。

清初入關時的「漢奸」主要有:北方的范文程、金之俊、吳三桂、洪承疇。「三藩之亂」時,「漢奸」有廣西的孔有德;廣東的尚可喜、耿仲明;陝地的趙良棟、張勇、五進寶、孫恩克;楚地的蔡毓榮、徐治都、萬正色;閩地的楊捷、吳興祚、趙貞;浙地的李之芳;粤地的傅宏烈。台灣鄭成功割據時,則有漢奸姚啟聖、藍理、施琅、施世驃。川楚白蓮教起義時,則有「漢奸」楊遇春、楊芳。太平天國時,則有曾國藩、曾國荃、胡林翼、李鴻章、左宗棠、駱秉章、沈葆楨、彭玉麟、羅澤南「殘殺同種」。咸同撚軍時,李鴻章、劉銘傳、張樹聲則「再殺同胞」。在政治、文化方面為清酋效力者,則有紀昀、阮元、趙中喬、岳鐘琪等,「如恒河沙數」⁶⁴。

到如今,要殺漢奸,必殺康有為、梁啟超;必殺張之洞;必殺「慶祝立憲黨」、必殺「各官吏之暴者」、必殺「各監督兵官之妖者」、必殺騎牆派。作者認為,「漢奸」與滿洲有密切的關係,實已同化於滿,所以,現在殺「漢奸」,「謂之殺漢奸也可,謂之殺滿人亦可也」⁶⁵。

再如《民報》所載《虎倀遺恨》,作者署名曰「有媯血胤」,內容也是揭露「漢奸」醜史的。它記錄的主要是清初為清平亂時的「漢奸」,有吳三桂、施琅父子、李光地等人。其中,吳三桂「率其醜虜,深入滇黔,窮搜緬甸,弒帝酖后,躬行悖慝」 ⁶⁶;施琅假託父仇,效忠異族,「負恩鄭氏,負恩明室,因以負恩於我中國」 ⁶⁷;李光地,名為理學名臣,卻不

知「嚴夷夏之大防,明春秋之本義」,無氣節,少志趣,「行傾險之鄙事,蠟丸告變,甘為 猛虎之倀」⁶⁸。

四 漢族燦爛文化——「國粹」

文化的差異是區分民族的重要手段之一。而且,一種民族文化形成後,具有相當的穩定性, 又成為聯繫民族的的紐帶和保持民族特性的工具。20世紀初,中國國內出現了一些「醉心歐 化」的現象。但是,因為當時清政府雖實行「新政」,但對傳統文化仍然堅持「中學為體, 西學為用」僵硬原則。清廷制定的教育總旨仍是「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實五端」⁶⁹。學部規 定的教育章程中,依然規定「經學」為必讀課目、治學之根本。河南巡撫、湖廣總督、湖南 巡撫、江蘇巡撫等紛紛上奏,要求建立存古學堂以保存「國粹」⁷⁰。在社會生活中,許多政 府官員仍然抱著傳統倫理綱常不放,更不用說領導下層「開放」和「西化」了。可見 「崇洋 媚外」之風遠未達到狂熱的程度。

中國的國粹思潮,與其說是針對歐化主義而發的,不如說是應乎「排滿」革命的需要而發的。革命派直接承接戊戌時代「保國、保種、保教」的餘緒,只不過他們的「國、種、教」,專指漢族的而已。他們需要借此來激揚民族精神,以資革命。「為甚提倡國粹?不是要人尊信孔教,只是要人愛惜我們漢種的歷史。」⁷¹

1906年章太炎從上海出獄東渡日本,出任《民報》主編,成立國學講習會,後又辦國學振起社,自任社長。許多留日青年雲集他的門下,聽他講解國學。章太炎也標榜「上天以國粹付余」,在主編《民報》後發表了一系列宣傳保存國粹的文章。章太炎把宣傳國粹與反清革命聯繫在一起,使民族的歷史文化變成了進行革命的思想武器。於是興起了一種國粹主義思潮。山西留學生主辦的《晉乘》居然把宣傳國粹列入他們的「六大主義」之首;《雲南》雜誌專出《滇粹》以表重視;《民報》也連篇累牘刊出論述國粹的文章,並聲明「專以歷史事實為根據以發揮民族主義」⁷²。

所謂的「國粹」,就是漢族古代的優秀文化,從先秦諸子到歷代思想家、政治家的論著,從音韻小學旁及典章制度、歷史人物、史學文學,等等。所以,革命派所維護的「國粹」,則是原原本本的漢族的族粹。章太炎認為國粹內容有三大類:「一是語言文字,二是典章制度,三是人物事蹟。」⁷³顯然,國粹派所說的「國粹」是指中國的傳統學術,基本相當於現今人們所稱的「國學」或「傳統文化」。因此,國粹派的最大成就也是學術。

同時,陶成章在東南亞創辦《教育今語雜誌》,也刊登了大量國粹派的文章。陶成章認為:「環球諸邦,興滅無常,其能屹立數千載而永存者,必有特異之學術,足以發揚其種性,擁護其民德者在焉。」⁷⁴可見,該雜誌也是「以保存國故,振興學藝」⁷⁵為宗旨,宏揚民族文化。其中所涉及的內容包括:中國文字學、群經學、諸子學、中國歷史學、中國地理學和中國教育學,等等。

雖然,國粹派已不同於以往的文化頑固派,不再視儒學為中國文化的全部,也不再以恢復和發揚儒學為最高理想。他們要對中國傳統文化加以發掘,結合時代特點,重塑近代中國文化。但是,狹隘的漢民族主義意識,又大大消融了革命者的民主性和進步性。而且,中國的國粹派不願放棄的「國學」,更多的還是指「儒學」。他們認為「國魂者,原於國學者也。

……而國學又出孔子者也。……倡國魂而保國學者,又曷能忘孔子哉!」 他們還一再強調 儒學的本義是反對專制政權的,只是被封建統治者利用了而已。所以他們呼籲要恢復儒學的 本來面貌,重新建立中國的「國粹」:「保全國學,……然尤當亟思改良,不為守舊,俾合於今日情勢,而使必不可滅。」⁷⁷也就是說,「黃帝堯舜湯文武周公孔子之學,猶足以長存。」⁷⁸由此不難理解的是,新文化運動興起時,劉師培辦《國故月刊》以對抗新文化。

總之,中國漢民族的心理,很大程度上是基於共同的傳統。中國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,各民族共同生活在東亞大陸廣袤的土地上,經常有民族爭端和民族戰爭發生,所以漢民族很早就形成了大漢族主義的「華夷之辨」,它的區分標準主要不是血緣和地域,而是文化的差異。同時由於地理環境的特殊,處於文化中心地位的華夏文化一直未受到外來文化強有力的衝擊,而是不斷地「同化」侵入中原的少數民族,這就更加強了漢族固有的文化優越感。國粹派面對自己民族燦爛的古代文化和源遠流長的學術傳統,就會不自覺地產生歷史負罪感。章太炎惶惶然,謂以「國故民紀,絕於余手,是則余之罪也」。79而且,他們更把「傳統學術」和「國學」看作立國的根本,是關係民族存亡的頭等大事。「學亡則國亡,國亡則亡族」80:「國粹存則其國存,國粹亡則其國亡。」81正是由於如此強烈的文化守成心理,才促使他們不惜毀家傾產去辦刊物,窮困潦倒中仍堅持講中國的傳統學術。他們的愛國熱腸是值得肯定和讚揚的。但是,他們又很容易為傳統文化中心的保守性所牽制,從而偏離原來預想的軌道。

五 結 語

革命派所述歷史都是以漢族史為中心,這與中國傳統的正統觀有著緊密的聯繫。這種局面實際上延續到了建國以後的很長一個時期。民族史學者劉先照先生曾著文批評這一現象,「古代民族如匈奴、突厥、契丹(遼)、女真(金)、蒙古(元)、滿(清)等族所建國家,是『中國』還是『外國』?建國以前,史學界佔統治地位的觀點,把他們作為『外國』。建國以後,用新的觀點看問題,大多數同志都把它們作為中國國內民族了。但現在把它們看作『外國』的觀點的影響存在,而且甚大。……例如一九八〇年再版的一本有名的通史就不止一次地說:蒙古『侵入中國』。最近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播送的一篇小說也說是『蒙古人侵略中國』。有的同志還堅持認為,匈奴、契丹、女真、蒙古等是『外族和外國』。這種觀點不能說是正確的。」⁸²所以,姜義華教授說:「真正的中國通史,應該是中華民族(56個民族)共同的歷史,而不僅是漢族通史。」⁸³

其實,人類社會進入近代以後,新的類型的民族也產生了。比如「中華民族」、「美國民族」,這些民族大都帶有很強的政治色彩,可以說本身也即政治的產物。「政治民族」只是民族與政治相聯繫的方式,或者說是民族在現代世界中賴以生存的外殼。在政治民族體內,往往包含著不同的文化民族,也就是說存在著不同的民族文化。雖然,民族國家也一直在國內加強政治民族認同的宣傳和「締造」,從而強化一個國家民族的形態。但這在目前的情況下,是難以在短期內實現的。而且,他的必要性也越來越受到人們的質疑。正如著名社會學家費孝通先生1988年在香港中文大學的泰納講座上所說:「我把自己從事民族研究的體會寫出來,用『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』這個概念來解釋中國民族研究中的歷史和文化特徵。我的用心其實十分簡單,就是試圖指出,在新的國家建設當中,我們必須注意到民族與民族之間、文化與文化之間的那種『和而不同』的關係。」84

註釋

- 1 參見孫隆基:〈清季民族主義與黃帝崇拜之發明〉,《歷史研究》,2000年第3期。
- 2 還有一些文獻把東夷族的首領——如少昊,以及某些北方戎狄族——如犬戎,也說成是黃帝的 後裔。(《世本》:「少昊,黃帝之子,名契。」《山海經·大荒北經》:「黃帝生苗龍,苗 龍生融吾,融吾生弄明,弄明生白犬……」)因此,直到當代,仍有學者把黃帝當成華夏族或 漢族的祖先,大部分人則認為黃帝是中華民族的祖先。
- 3 《梁啟超全集》第一冊,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,第450頁。
- 4 太平洋客(歐榘甲):〈新廣東〉,《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》第一卷,第306頁。
- 5 〈黄史〉,《國粹學報》1905年2月,第9頁。
- 6 船山全書編輯委員會:《船山全書》第12冊,岳麓書社1992年版,第501頁。
- 7 同上,第534頁。
- 8 〈中夏亡國二百四十年紀念會書〉,《章太炎全集》第4冊,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,第189 頁。
- 9 歐榘甲:〈新廣東〉,《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》第一卷,第273頁。
- 10 〈軍國民教育會紀事〉,軍國民教育會1903年自印本。轉引自李喜所:《近代中國的留學生》,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,第160頁。
- 11 馮自由:《革命逸史》初集,中華書局1981年版,第110頁。
- 12 《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》第一卷,第670頁。
- 13 同上,第763 764頁。
- 14 同上,第722頁。
- 15 《劉師培辛亥前文選》,北京三聯書店1998年版,第15頁。
- 16 陳天華:〈《猛回頭》黃帝肖像後題〉,見《猛回頭·警世鐘》,華夏出版社2002年版,第4 頁。
- 17 同上。
- 18 《孫中山全集》第1卷,中華書局1981年版,第298頁。
- 19 季子:〈革命其可免乎〉,《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》第一卷,第560頁。
- 20 〈革命製造廠〉,《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》第一卷,第578頁。
- 21 漢駒:〈新政府之建設〉,《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》第一卷,第580頁。
- 22 壯遊:〈國民新靈魂〉,《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》第一卷,第576頁。
- 23 書屢:〈教育會為民團之基礎〉,《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》第一卷,第550頁。
- 24 許之衡:〈讀「國粹學報」感言〉,《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》第二卷,第49頁。
- 25 《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》第一卷,第722頁。
- 26 柏明、李穎科:〈黃帝與黃帝陵〉,西北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,第134頁。
- 27 《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》第一卷,第721頁。
- 28 宋教仁:〈漢族侵略史‧敘例〉,陳旭麓主編:《宋教仁集》,中華書局1981年版,第6頁。
- 29 有說來自埃及;有說來自中亞細亞;有說來自土耳其斯坦之西南和闐之俄亞希斯;有說來自印度;還有說來自印度支那半島;赫胥黎則主張來自亞美利加大陸或美洲北部。

- 30 繆鳳林:〈中國民族西來辨〉,原載《學衡》第37期。見朱慶葆主編:《南京大學百年學術精品.歷史學卷》,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,第257頁。
- 31 陳旭麓主編:《宋教仁集》(上冊),中華書局1981年版,第2頁。
- 32 〈攘書·華夏篇〉,李妙根編選:《國粹與西化——劉師培文選》,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年版,第64⁻65頁。
- 33 白話道人(林懈):〈國民意見書·序論〉,《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》第一卷,第892 頁。
- 34 《康有為政論集》,第669、403、667頁。
- 35 《嚴復集》,中華書局1986年版,第145、148頁。
- 36 《革命軍》,《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》第一卷,第667頁。
- 37 同上,第651頁。
- 38 金宏淦編:《國民新讀本》,「卷首」第1頁,上海書局1906年9月。
- 39 宋教仁:〈漢族侵略史·敘例〉,陳旭麓主編:《宋教仁集》(上冊),中華書局1981年版, 第2頁。
- 40 同上,第6頁。
- 41 同上,第5頁。
- 42 湯志鈞編:《陶成章集》,中華書局1981年版,第212-213頁。
- 43 同上,第214頁。
- 44 同上,第213 214頁。
- 45 參見陶緒:〈章太炎民族主義的思想淵源〉,《中州學刊》1996年第3期。
- 46 鐵兒(胡適):〈愛國〉,《競業旬報》第34期,1908年11月。
- 47 丁守和:《辛亥革命時期期刊介紹》(第三集),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,第275頁。
- 48 俞旦初:《愛國主義與中國近代史學》,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版,第265頁。
- 49 常恒芳:〈記安慶岳王會〉,《辛亥革命回憶錄》(四),中華書局1963年版,第438~441頁。
- 50 丁守和:《辛亥革命時期期刊介紹》(第二集),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,第230-231頁。
- 51 漢兒:〈為民族流血史可法傳〉,《江蘇》第6期,第71~81頁。
- 52 〈陸沉痛傳奇〉,《漢聲》第7、8期,1904年。
- 53 亞廬(柳亞子):〈鄭成功傳〉,《江蘇》第4期,第61-71頁。
- 54 《民報》第9號,第113頁。
- 55 陶成章在〈桑澥遺征序〉中說:「中原板蕩,索虜入居,屠戮之餘,繼以焚坑,公私塗炭,文獻蕩然。……邇來東歐化東行,求學之士,往往土苴其朔,後生小子,于故書雅記,乃至百不窺一,何怪其民族思想之銷沉哉!」可見,是借歷史喚起漢族的民族意識,以求排滿。
- 56 〈墳·雜憶〉,《魯迅全集》第1卷,第318頁。
- 57 参見鄭師渠:《國粹、國學、國魂:晚清國粹派文化思想研究》,台北:文津出版社1992年版,第238頁。
- 58 章士釗:〈漢奸辨〉,《章士釗全集》第一冊,文匯出版社2000年版,第158頁。
- 59 同上。
- 60 中國史學會主編:《中國的代史資料叢刊·辛亥革命》(二),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,第 172頁。

- 61 同上,第174頁。
- 62 同上,第174頁。
- 63 同上,第175頁。
- 64 同上,第179頁。
- 65 同上,第183頁。
- 66 有媯血胤:〈虎倀遺恨〉,《民報》第22號,第105頁。
- 67 同上。
- 68 同上,第106頁。
- 69 《清實錄(五九)·德宗實錄(八)》,中華書局1987年版,第377頁。
- 70 《清朝續文獻通考·學校14》卷107,(台北)新興書局,中華民國五十四(1965)年版,第 8661^-8663 頁。
- 71 〈東京留學生歡迎會演說辭〉,《章太炎政論選集》上冊,第276頁。
- 72 《民報》第19號。
- 73 〈東京留學生歡迎會演說辭〉,《章太炎政論選集》上冊,第276頁。
- 74 〈刊行《教育今語雜誌》之緣起〉,《陶成章集》,第451頁。
- 75 〈《教育今語雜誌》章程〉,《陶成章集》,第451頁。
- 76 許之衡:〈讀「國粹學報」感言〉,《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》第二卷,第49頁。
- 77 同上。
- 78 黄節:〈「國粹學報」敘〉,《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》第二卷,第43頁。
- 79 〈章太炎癸卯口中漫筆〉,《國粹學報》第1年,第9期。
- 80 黄節:〈「國粹學報」敘〉,《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》第二卷,第43頁。
- 81 許守徵:〈論國粹無阻於歐化〉,《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》第二卷,第52頁。
- 82 劉先照、韋世明:《民族文史論集》,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,第266頁。
- 83 嚴明:〈姜義華教授訪談錄〉,《歷史教學問題》1998年2月。
- 84 費孝通:〈百年中國社會變遷與全球化過程中的「文化自覺」〉,《求是學刊》2000年第6期。

王春霞 女,1975年生,2003年獲南京大學歷史學博士,研究方向為中國近現代思想史、社會 史。現為浙江財經學院法學院講師。

《二十一世紀》(http://www.cuhk.edu.hk/ics/21c) 《二十一世紀》網絡版第三十一期 2004年10月31日

© 香港中文大學

本文於《二十一世紀》網絡版第三十一期(2004年10月31日)首發,如欲轉載、翻譯或收輯本文文字或圖片,必須 聯絡作者獲得許可。